

# 论《三国志》的人物评价

庞天佑

(湛江师范学院 历史系,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三国志》的人物评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认识陈寿的史学思想。我认为,陈寿评价人物,其标准可以概括为识量器局与儒家伦理两个层次,前者是外在层次,后者是内在层次。他通过具体分析与辩证考察,对人物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既包括直接评价,又有间接评价。陈寿善于在人物评价中使用归纳方法与比较方法。

[关键词]《三国志》 陈寿 历史人物评价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02)02-0030-08

陈寿的《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其中除第三十卷《乌丸鲜卑东夷传》所记为当时活动于中国北部地区的乌丸、鲜卑、东夷等民族以外,其余全是三国人物的传记。故《三国志》实为三国人物志,书中记载了三国时期数百个重要人物的生平行为与主要业绩。《三国志》对人物的评价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中论及了《三国志》的人物评价问题<sup>①</sup>,正确地指出了《三国志》人物评价的标准与方法。在这里,我对《三国志》人物评价的标准、特征、方式、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作一点进一步的探讨。

## 一、识量器局与儒家伦理

陈寿评价人物的标准,可以划分为外在标准与内在标准两个层次。其外在层次的标准是识量器局,而内在层次的标准则是儒家伦理。这是因为陈寿的史学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具体表现现象魏晋玄学盛行时清谈家品评人物一样,通常以识量器局衡量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有着强烈的儒家正统思想,以儒家伦理评价人物。

陈寿如同魏晋时期的名士一样,以所谓识量器局即风度、才性、才情、文采等为评价人物的标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三国志》的人物传记中,陈寿非常喜欢称赞传主的外表容貌,而外表容貌往往是风度气质的外在表现。请看《三国志》对下列人物的描绘:袁绍“姿貌威容”。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公孙瓒“有姿仪,大音声”。程昱“长八尺三寸,美须髯”。臧洪“体貌魁梧,有异于人”。管宁“长八尺,美须眉”。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何夔“长八尺三寸,容貌矜严”。许褚“长八尺余,腰大十围,容貌雄毅,勇力绝人”。典韦“形貌魁梧,膂力过人,有志节任侠”。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彭越“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姿性骄傲,多所轻忽”。孙策“美姿颜,好笑语”。孙权“容貌奇伟,骨体不恒”。周瑜“长壮有姿貌”。张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太史慈“长七尺七寸,美须髯”。黄盖“姿貌严毅”。

[收稿日期] 2001-09-10

<sup>①</sup>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8—166页。

吕范“有容观姿貌”。陆绩“容貌雄壮”。张温“容貌奇伟”。程普“有容貌计略”<sup>①</sup>。陈寿喜欢以简洁的语言,对于人物外表进行描绘,诸如此类,可谓不胜枚举。这种现象,在此之前的正史中是未曾有过的。而这种现象在《三国志》中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这一时期在玄学影响下,人们喜欢从外表容貌来评说人物,这在当时社会中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又说明陈寿本人如同这一时期其他学者一样,也深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第二,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陈寿喜欢直接称述传主的风度、风貌、才性、才情等。如何晏“少以才秀知名”。袁涣“清静,举动必以礼”。张范“性恬静乐道,忽于荣利”。乐进“容貌短小,以胆烈于太祖”。钟会“少敏慧夙成”。胡质“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检物,所在见思”。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许靖“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马谡“才器过人”。刘琰“有风流,善谈论”。杜琼“为人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谯周“身長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马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恢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诸葛谨“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严翊“性质直纯厚,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sup>②</sup>。这类事例,在《三国志》中极多。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的影响,整个社会都喜欢称道人物的风度、风貌、才性、才情等,而门阀士族人物也往往通过显示其风度、风貌、才性、才情等,体现自己超凡脱俗,卓异不凡的特性。第三,在《三国志》人物传记的后面,陈寿通过“评曰”的形式,为某些卓越的人物加上称号,如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刘备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孙权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周瑜、鲁肃为“奇才”;吕蒙为“国士”;庞统为“高俊”;关羽、张飞为“虎臣”;杜微、周群、杜琼等“皆一时之学士”;陆逊为“社稷之臣”;钟繇、华歆、王朗为“一时之俊伟”。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为“世之奇士”;和洽、常林、杨俊、杜袭、赵俨、裴潜为“美士”;徐邈、胡质、王昶、王基为“国之良臣,时之彦士”,董和、刘巴、马良为“令士”;程普、黄盖等为“江表之虎臣”。王粲、秦宓等为“才士”<sup>③</sup>。这些称号通常是对有关人物的才性、风度、品格等的最为简要的评价,表现出陈寿“对人物局量才识特别有兴趣”<sup>④</sup>。第四,在“评曰”中,陈寿通过对传主的才性、器识等直接加以评论,阐发自己的看法。如文帝曹丕“天资文藻”。荀彧“清秀通雅”。麋竺、孙乾、简雍、伊籍,“皆雍容风仪,见礼于世”。秦宓“文藻壮美”。黄权“弘雅思量”。张寔“识断明果”。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是仪“清恪贞素”。胡综“文采才用”。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才理条畅”,贺邵“厉志高洁,机理清要”<sup>⑤</sup>。此类评价,不胜枚举。大量事例都极为清楚地表明,陈寿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以识量器局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

陈寿一方面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儒家正统思想。他以儒家伦理衡量历史人物。陈寿认为,三足鼎立,正统在魏。他从这种思想出发来审视魏、蜀、吴三国君主的历史地位,为曹魏的君主立纪,而对蜀、吴的君主则立传。《武帝纪》言:“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文帝纪》称:“初,汉熹平五年(176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凤,‘此何祥也?’凤曰:‘其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凤之言,其验兹乎?’”这些记载旨在表明,曹魏君主是应承天命的正统天子,其代汉体现了天意。在《三国志》中,陈寿以儒家伦理评述人物的品德、性格、生平、业绩、为官为人之道及其历史地位等。他引用时人之语,称颂邢德、德行堂

① 参见《三国志》的袁绍、刘表、公孙瓒等人的本传。

② 参见《三国志》的何晏、袁涣、张范等人的本传。

③ 参见《三国志》的曹操、刘备、孙权等有关人物的纪传后面的“评曰”。

④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1页。

⑤ 参见《三国志》的曹丕、荀彧、麋竺等有关人物的纪传后面的“评曰”。

堂”<sup>①</sup>。他称道袁涣遵循礼制，“举动必以礼”，后为袁术所命，“术每有所咨访，涣常正议，术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礼也。”<sup>②</sup>他赞扬国渊具有正直的品格，称其“每于公朝论议，常直言正色，退无私焉”<sup>③</sup>。他称赞司马芝谨守孝道，在其避乱荆州时，“于鲁阳山遇贼，同行者皆弃老弱走，芝独坐守老母。贼至，以刃临芝，芝叩头曰：‘母老，唯在诸君！’贼曰：‘此孝子也，杀之不义。’遂得免害，以鹿车推载母。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sup>④</sup>他极为推崇臧洪的忠义，《臧洪传》载其言：“义不背亲，忠不违君”，并载其守东郡抗袁绍事说：“城中粮谷以尽，外无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谓曰：‘袁氏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将。洪于大义，不得不死，念诸君无事空与此祸！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将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与袁氏本无怨隙，今为本朝郡将之故，自致残困，吏民何忍当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可复食者。主簿启内厨米三斗，请中分稍以为糜粥，洪叹曰：‘独食此何为！使作薄粥，众分之，杀其爱妾以食将士。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在陈寿的笔下，臧洪是一个坚守节义，忠贞不屈的英雄。该传还记载臧洪同邑少年陈容，因仰慕臧洪忠义，见其被袁绍所执，对袁绍说：“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陈寿对臧洪忠贞不屈给以高度评价，称赞其“雄气壮节”。陈寿强调，“亲亲恩义，古今之常。宗子维城，诗人所称”<sup>⑤</sup>，认为君位继承，应该“立子以胤，若胤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他进而批评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胤付不专，必参枝族”<sup>⑥</sup>，最后导致皇权的衰落。他又引用《易》、《诗》之言，强调谨守儒家伦理对于治理国家的意义，并以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及三国时期吴主孙权为例，指出，“《易》称：‘正家而天下定’。《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诚哉！是言也！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由是论之，惟以道义为心，平一为主者，然后克免斯累邪！”<sup>⑦</sup>这说明，儒家伦理是陈寿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

## 二、具体考察与辩证分析

陈寿评价人物，往往将具体考察与辩证分析结合起来。他既能对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进行具体分析，又能将这些人物置身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既能看到历史人物兴衰成败相互转化，又能看到历史人物各自的长短得失，并且往往能对历史人物进行整体分析。

陈寿善于针对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进行评价。《三国志》所记载的历史人物，有帝王、贵族、官僚、文人、学者、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经学家，乃至方技、术士、妇女等。陈寿对这些人物的评价，涉及到外表、容貌、性格、品德、才性、风貌、生平、业绩、学识、交友及为官为人之道等不同方面。他没有也不可能对书中所记载的这些人物的所有方面进行评价，但他确实紧紧把握住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通过概括每一人物的个性特征进行评价。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sup>⑧</sup>。在其笔下，这些人物一个个活龙活现，栩栩如生。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也往往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如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袁术“奢淫放肆”。袁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刘表“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sup>⑨</sup>。桓阶“识睹成败，才周当世”。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

① 《三国志·魏书·刑胤传》。

② 《三国志·魏书·袁涣传》。

③ 《三国志·魏书·国渊传》。

④ 《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

⑤ 参见《三国志·吴书·宗室传》的“评曰”。

⑥ 参见《三国志·魏书·少帝纪》的“评曰”。

⑦ 《三国志·吴书·妃嫔传》的“评曰”。

⑧ 参见《晋书·陈寿传》。

⑨ 参见《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及其“评曰”。

望”。陈泰“弘济简至，允克堂构”<sup>①</sup>。钟繇“开达理干”，华歆“清纯德素”，王朗“文博富贍”<sup>②</sup>。于禁“最号毅重，然弗克其终”。张辽“以巧变为称”。乐进“以果显名”<sup>③</sup>。任城王曹彰“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陈思王曹植“文才富艳”<sup>④</sup>。满宠“立志刚毅，勇而有谋”，田豫“居身清白，规略明练”，牵招“秉义壮烈，威绩显著”，郭淮“方策精详”<sup>⑤</sup>。董和“蹈羔羊之素”。刘巴“履清尚之节”。马良“贞实，称为令士”。陈震“忠恪，老而益笃”。董允“匡主，义形于色”<sup>⑥</sup>。霍峻“孤城不倾”，王连“固节不移”，向朗“好学不倦”，张裔“肤敏应机”，杨洪“乃心忠公”，费诗“率意而言”<sup>⑦</sup>。是仪“清恪贞素”，徐祥“数通使命”，胡综“文采才用”<sup>⑧</sup>。从这类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人物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陈寿善于将人物置之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评价。如他从汉末分裂割据的天下大势来审视曹操的历史地位，指出：“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sup>⑨</sup>又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据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撻宇内，揽申、商之法，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sup>⑩</sup>这些评述表明，在陈寿看来，曹操之所以能成就大业，就是因为汉末的社会环境为他提供了历史机遇，而曹操正好把握了这种机遇。又如他从环境对后主刘禅施政的影响来审视其历史地位，指出：“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sup>⑪</sup>在陈寿看来，后主刘禅平庸无能，如有贤相辅佐或可成为循理之君，而被阉竖操纵则必然成为昏暗之主。即使在刘备去世之后由诸葛亮辅政之时，尚且存在诸多缺欠，那么，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治渐趋衰败也就成为必然之势。这些评价，符合后主刘禅的个性特征与其统治蜀汉的实际情况。又如他从山越与孙吴统治者的关系来考察孙吴的政策，指出“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是由于“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所决定的<sup>⑫</sup>。这些论断符合事实。

陈寿考察历史人物，能够看到兴衰成败之间相互转化。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物盛而衰，这是必然规律。他引用荀彧语，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sup>⑬</sup>夏侯氏与曹氏，“世为婚姻”，构成曹魏政权的中坚与支柱。陈寿立《诸夏侯曹传》来记载这两大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夏侯渊、夏侯渊、曹仁、曹洪、曹休、曹真、曹爽、夏侯尚、夏侯玄等人的兴衰成败。而考察这两个家族成员的兴衰成败，实际上成为考察曹魏政权兴衰成败的一面镜子。尽管这两大家族的成员“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然也避免不了盛极而衰的历史命运。陈寿述及清河王经始为郡守，“经母谓经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过不祥，可以止矣。’经不能从，历二州刺史，司隶校尉，终以致败。”这段叙述，借清河王母之口，说出极为深

① 《三国志·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的“评曰”。

② 《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的“评曰”。

③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的“评曰”。

④ 《三国·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的“评曰”。

⑤ 《三国志·魏书·满田牵郭传》的“评曰”。

⑥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的“评曰”。

⑦ 《三国志·蜀书·霍王向张杨费传》的“评曰”。

⑧ 《三国志·吴书·是仪胡综传》的“评曰”。

⑨ 参见《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的“评曰”。

⑩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评曰”。

⑪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的“评曰”。

⑫ 参见《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的“评曰”。

⑬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刻的兴衰成败相互转化的道理，并以清河王经致败的事例来印证这一道理。陈寿认为，曹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而夏侯玄“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然与曹爽中外缱绻，荣位如斯，曾未闻匡弼其非，援致良才。举兹以论，焉能免之乎！”<sup>①</sup> 在陈寿看来，无论是清河王经，还是曹爽、夏侯玄等人，他们由盛而衰，终致败亡，绝非简单的个人悲剧，而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陈寿考察历史人物，能够对其是非功过与长短得失作出正确评价。如他既充分肯定诸葛亮治蜀的业绩，称赞其为“识治之良才”，然而又指出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应变将略，非其所长”<sup>②</sup>。他既肯定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并有国土之风”，又能指出“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sup>③</sup>。他既指出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又批评其“玩众黷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sup>④</sup>。他既称赞杨戏“商略，意在不群”，又认为其“智度有短，殆罹世难”<sup>⑤</sup>。他既称道孙坚“勇挚刚毅”，“有忠壮之烈”，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又评论他们“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sup>⑥</sup>。他既赞扬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又指责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sup>⑦</sup>。他既称赞诸葛亮“才气干略，邦人所称”，又指责其“骄且吝”，“矜己陵人”<sup>⑧</sup>。陈寿评论历史人物，不仅能够看到其优点，而且能够指出其缺点。大量事例说明，其人物评价中，有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陈寿考察历史人物，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类人，都能从整体上作出判断，进行全面分析，然后加以评价。如对吕布，陈寿认为其“有鬪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sup>⑨</sup> 这一评价说明，陈寿看到了吕布有勇无谋，唯利是图的本质。在这种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他进而指出其覆灭具有必然性，这些见解反映出陈寿对吕布的整体认识，确实是深刻的。又如对曹魏一代后妃，陈寿从整体上进行考察以后指出：“魏后妃之家，虽云富贵，未有若衰汉乖非其据，宰割朝政者也。鉴往易轨，于斯为美。”<sup>⑩</sup> 这说明陈寿看到了曹魏的后妃虽地位高贵，但并不干预朝政。这种认识是符合事实的。又如对曹魏宗室诸王，陈寿也能从整体上分析其特点，指出其“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sup>⑪</sup>，致使骨肉之恩乖离，亲亲之义背弃。陈寿的这些看法，大体上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 三、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

陈寿评价人物，可以概括为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两种形式。所谓直接评价，就是在每一篇人物传记的末尾，以“评曰”为题，写上一段史论。“评曰”，顾名思义，就是以对传主直接进行评价。所谓间接评价，则是在每一篇人物传记中，边叙边评，在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的过程中对其才能、性格、气质、思想、品德、业绩等某一方面进行评价。

直接评价是对传主生平行事、思想品德、个人业绩等方面情况的总结。无论何种类型的人物，陈寿都要以识量器局与儒家伦理为标准，对其作出自己的评价。当然，陈寿不是也不可能对每一方面都评，而是抓住其主要特点进行评价。如《文帝纪》的“评曰”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

① 参见《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及其“评曰”。

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评曰”。

③ 《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的“评曰”。

④ 《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的“评曰”。

⑤ 《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的“评曰”。

⑥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的“评曰”。

⑦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的“评曰”。

⑧ 《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的“评曰”。

⑨ 《三国志·魏书·吕布臧洪传》的“评曰”。

⑩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的“评曰”。

⑪ 《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的“评曰”。

强识，才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在这里，陈寿抓住文帝的主要特点，既充分肯定其富于文采，才华横溢；又以委婉的语气批评其心胸不够宽广。这一评价是很贴切的。如《明帝纪》的“评曰”说：“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弊，四海崩崩，不先聿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在这里，陈寿抓住明帝刚愎自用，追求奢华的个性特征，直截了当地批评他走上了秦皇、汉武的老路。这一评价是很正确的。如《张顾诸葛步传》的“评曰”说：“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饬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既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从容间巷，养老而已，以此明权之不及策也。”在这里，陈寿高度评价了张昭孝忠朝廷，一心为国的崇高品质，并由其在孙权手下不得重用，得出孙权治国不及孙策的结论，这一评价是比较平实的。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列举了陈寿在“评曰”中对传主直接进行评价的许多事例，从总体上来说，这类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毫无疑问，陈寿的《三国志》中的“评曰”是继承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及班固的《汉书》中的“赞曰”而来，但从内容与语言风格来看，前者与后两者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一，“评曰”主要是直接评论传主，极少涉及到与传主无关的人和事；而“太史公曰”及“赞曰”往往在传中内容基础上多有发挥，甚至抒发作者的感慨。其二，“评曰”对历史人物的评论通常极为简单，语言精炼；而“太史公曰”及“赞曰”因并不一定是直接评论传主，故一般内容较多，不如“评曰”那样语言精炼而直截了当。其三，“评曰”对传主所作出的评价，通常是对传中内容直接的概括，而“太史公曰”及“赞曰”通常多有发挥，所论往往及至其它历史人物或历史问题。

间接评价是在叙述传主生平事迹的过程中对其某一方面作出的评价。如《董卓传》称其“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以千数。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这几句简洁的评价真实地反映了董卓的凶残本质。《袁术传》称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这里陈寿对袁术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的评价，完全符合事实。《张范传》称其“性恬静乐道，忽于荣利，征命无所就”。这一评价真实地反映出张范淡泊名利的品格。《程昱传》称其“性刚戾，与人多违”。这一评价真实地反映了程昱刚直的性格。《步骘传》称其“性宽弘得众，喜怒不形于声色，而外内肃然”。这一评价真实反映了步骘沉着稳重而宽弘大度的个性特征。在许多传记中，陈寿还经常引用时人之语来评价人物。如《臧洪传》引张超语，称臧洪为“海内奇士”。《曹仁传》载陈矫语，称曹仁为“真天人”。《荀彧传》载何夔语，称其为“王佐才”。《崔琰传》引曹操语，称赞崔琰“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邴原传》引崔琰之语，称邴原“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所谓龙翰凤翼，国之重宝”。《先主传》引曹操语，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诸葛亮传》引其语，称董厥为“良士”。《马谡传》引刘备临死时对诸葛亮所说之语：“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费祎传》引孙权语，称之为“天下淑德”。《黄权传》引司马懿书中语，称赞黄权为“快士”。这类事例，在《三国志》中还有不少。陈寿引用其他人的话作为对有关人物的评价，这是他评价人物的一种技巧，不仅增强了有关传记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使他对有关人物所作出的评价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这一方面反映出陈寿有着很高的语言艺术，善于运用时人之语来刻画人物；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他具有很强的驾驭史料的能力，善于收集与运用第一手史料来说明问题。

在《三国志》中，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两者浑然一体。如《崔林传》称其“为政推诚，简存大体”，“评曰”则称其“简朴知能”；《邓芝传》言其“赏罚明断，善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评曰”则称其“坚贞简亮，临官忘家”。《张昭传》称其“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并引孙权语：“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评曰”则称其“忠饬方直，动不为己”。《孙峻传》称其“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评曰”则称其“凶竖盈溢”。这些事例说明，在《三国志》中，间接评价是直接评价的基础与前提，而直接评价则是在间接评价的基础的进一步概括与总结。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在叙述人物生平事迹的过程中寄寓着作者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渗透在充满感情的语言之中，读者一般可以通过字里行间的笔调而自然体察；那么陈寿

的《三国志》则是边叙边评，结合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叙述而作出评价。如果说《史记》对人物的评价的特点是委婉、含蓄而又富有感情，那么《三国志》对人物的评价的特点则是明确、简洁而又直截了当。

#### 四、归纳方法与比较方法

陈寿以识量器局与儒家伦理为标准评价人物，主要是通过对人物的生平事迹与兴衰成败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出结论。其人物评价极少空洞的伦理道德说教，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道德判断。他一方面运用归纳的方法，通过概括同类人物的共性而作出评价；另一方面，则大量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分析比较不同人物的个性而作出评价。

陈寿的人物评价大量使用归纳的方法。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在《三国志》中，除极少数几篇独传或记两人的合传以外，大都是记载多人的合传。全书基本上是由记载多人的合传组成，通过合传分别记载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这是《三国志》编撰结构的重要特点。如陈寿认为，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属于一种类型的人物，故立《董二袁刘传》来加以记载，钟繇、华歆、王朗属于一种类型的人物，故将三人合于一传来加以记载；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人构成曹魏政权的中坚与支柱，故立《诸夏侯曹传》来加以记载；董和、刘巴、马良、陈震、董允等蜀汉政权的良臣属于一类，故立《董刘马陈董吕传》来加以记载。程普、黄盖等十二位孙吴政权的武将，陈寿将其合为一传，并在该传末尾的“评曰”中说：“凡此诸将，皆江表之虎臣，孙氏之所厚待也。”<sup>①</sup>从《三国志》全书的结构来说，将数百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加以区分归类，分别用合传来进行记载，这本身就是对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特点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归纳的结果。其二，在许多合传中，陈寿在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之后，通过“评曰”的形式，对同类人物的特点进行归纳。如《董二袁刘传》的“评曰”称：“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这里，陈寿归纳出袁绍、刘表二人的共性，概括起来有六：1、有威容器观；2、名声显赫；3、占据广阔的土地；4、外宽内忌；5、好谋无决；6、废嫡立庶等。这些共性实质上就是对袁绍、刘表二人共同的评价。《二公孙陶四张传》的“评曰”称：公孙瓒、公孙度、公孙渊、陶谦、张杨五人“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这里，陈寿指称此五人“不若”匹夫，无可称述，是分析其凶残暴虐的共性进而加以归纳的结果。在《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的“评曰”中，陈寿归纳袁涣、邴原、张范的共同特征是“躬履清蹈，进退以道”。《徐胡二王传》的“评曰”称：徐邈、胡质、王昶、王基，“皆掌统方任，垂称著绩”。陈寿通过归纳其忠于职守，政绩显赫的共性，对其作出了“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的评价。《韩崔高孙王传》的“评曰”中说：韩暨“处以静居行化，出以任职流称”；崔林“简朴知能”，高柔“明于法理”；孙礼“刚断伉厉”；王观“清劲贞白”。在对他们五人的个性特征概况的基础上，陈寿归纳出他们的共性：“咸克致公辅”。《王丘诸葛邓钟传》的“评曰”称：王丘俭、丘俭、诸葛诞、钟会，或因风节，或因才识，或因严毅，或因精练等，“咸以显名，致兹荣任”。陈寿归纳出他们“心大志迂”的共性，指出这是导致他们“宗族涂地”的原因所在。《吴范刘赵达传》中，先叙述吴范“治历数，知风气”；刘以“明天官达占数显于南土”；赵达“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然后在“评曰”中，陈寿归纳说：“三子各于其术精矣，其用思妙矣”。三人虽然各有所长，但都有用思巧妙，精于其术的特征。

陈寿善于使用比较方法评价人物。通过比较，可以使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陈寿运用比较方法，首先是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如《陶谦传》称其“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琅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这里将陶谦对待两种不同人的两种不同的态度进行比较。《程郭董刘蒋刘传》的“评曰”中称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五人，“虽清治

<sup>①</sup> 《三国志·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徐潘丁传》的“评曰”。

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这里将程昱等人与荀攸相比。《庞统法正传》的“评曰”中，分别将庞统与曹魏的荀攸相比，而将法正与程昱、郭嘉相比。《费 传》载其出使孙吴，孙权让诸葛恪等与之论辩，“ 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这里将费 与诸葛恪相比。《陆逊传》的“评曰”中说：“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这里将陆逊与刘备相比。《王楼贺韦华传》的“评曰”中，陈寿引胡冲之语，将王蕃、楼玄、贺邵、韦曜、华 比较，称楼玄、贺邵、王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 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其次是与前人相比。如《三少帝纪》的“评曰”说：“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 封大国，作宾于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这里将曹魏的末代皇帝陈留王曹奂与东汉的末代皇帝禅晋以后被封为山阳公的刘协相比。《董二袁刘传》的“评曰”中说：“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这里将专横的袁绍与刚愎自用的楚霸王项羽相比。《荀 荀攸贾诩传》的“评曰”说：“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这里将曹操的重要谋士荀攸、贾诩与汉高祖刘邦的主要谋士张良、陈平相比。《毛阶传》载曹操言，将毛阶与刘邦手下刚正不阿的周昌相比。《徐奕传》载曹操言，将徐奕与楚国的子玉、西汉的汲黯相比。《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载曹操言，称许褚为其樊哙，并在“评曰”中说：许褚、典韦，“折冲左右，抑亦汉之樊哙也。”这里将许、典二人与樊哙相比。《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的“评曰”归纳出辛毗、杨阜的共性：“刚亮公直，正谏匪躬”，并将他们与西汉的汲黯相比，称其“亚乎汲黯之高风焉”。《先主传》的“评曰”中，将先主刘备与汉高祖刘邦相比，称其“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诸葛亮传》的“评曰”中，将其与管仲、萧和相比，称之为“管、萧之亚匹”。《吴主传》的“评曰”中，将孙权与越王句践相比，称其“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的“评曰”中，将陆绩比作“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严周”。第三是同类人物比较。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这五人都是为蜀汉政权建树了显赫战功的武将，故陈寿以一个合传来加以记载。然他们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如关羽与张飞，他们“皆称万人之敌”，“并有国士之风”，都是“以短取败”，陈寿在指出这些共性之后，又比较他们的个性：“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sup>①</sup>。又如王蕃、楼玄、贺邵、韦曜、华 这五人是江左著名文人，陈寿引述胡冲之语，认为楼玄、贺邵、王蕃均为“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 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sup>②</sup> 这一比较，比出了这五位江左文人的高下浅深。

从这些事例可见，陈寿的人物评价既大量运用归纳方法，又善于使用比较方法的特点。

① 参见《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的“评曰”。

② 参见《三国志·吴书·王楼贺韦华传》的“评曰”。

## Evaluation of People in *SANGUOZHI*

Pang Tianyou

[ **Abstract:** ] Evaluation of people in *SANGUO* (the Three Kingdoms) will beneficially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Chen Shou's historical thoughts. The thesis concludes Chen Shou's standard of character evaluation as two layers: one is the external elegance and intelligence, the other internal Confucius ethics. Chen used the inductive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character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his analysis and dialectical observation.

[ **Key Words** ] *SANGUOZHI* Cheng Shou Evaluating Historical Persons